

文史資料輯存

第八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常熟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编 辑 凡 例

- 一、本辑存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并推动撰写史料工作的开展。所选的资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一定有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辑存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以备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 二、本辑存所选的资料，包括从清末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个方面。稿件只要确有史料价值，不限体裁。
- 三、本辑存所刊印的资料，欢迎阅读者提出补充和订正。
- 四、本辑存编辑者对来稿可以选录、删节和作文字上的修改。

文史资料辑存第八辑

目 录

- 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成立的前前后后 陈 刚 (1)
关于从常熟县财务委员会到苏常太
 经济委员会的一些回忆 陶 然 (23)
青萍常青——记徐青萍烈士 嵇振飞 吴宝珩 (28)
参加常熟抗敌后援会的回忆 倪冠亚 (33)
马诛斋 马钟奎 (51)
常熟的染织 (布厂) 工业 刘哲明整理 (61)
常熟纱市场 毛炽和 (88)
常熟银钱业史纪略 何 崇整理 王一琴校订 (96)
常熟典当业史话 朱勤庵 杨秉仁 (123)
常熟木业点滴 陆长华 (136)
常熟县名小考 谢国鑫 (145)
漫话铁琴铜剑楼 瞿冕良 (150)
虞山琴派史话 翁瘦菴 (156)
胡琴名家陈道安 陈小田 (163)
二十至三十年代的常熟美术组织 温肇桐 (168)
记常熟集善医院 于东明 (176)
《文史资料辑存》第六辑和第七辑勘误表 (180)

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成立的前前后后

陈 刚

建立“人救” 组织武装 奋起救亡

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是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在东乡梅李塘桥成立的。

常熟东乡梅李、浒浦一带，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一九三四年初，梅李陆同福布庄的职员李建模就已从事革命活动。他和浒浦顾鉴修等发起组织了“艺丝社”，出版文艺刊物，宣传马列主义。加入“艺丝社”的，大都是市镇店员职工，约有二、三十人。我是在“艺丝社”成立大会上认识李建模的。五月间，“艺丝社”被封，七月成立了“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常熟分会”。当时，通过李建模与上海党的联系，建立了党的组织，党员有顾鉴修、张可群、薛惠民、李凌和我。尔后，华玉鼎、茆春华也接着入了党。农民中间也有党员，有薛苟苟、薛三明等。到一九三六年夏，上海武装自卫会总会和党组织被破坏，我们暂时失去了联系，但仍在进行抗日救亡的秘密活动，李凌、顾鉴修和我组织了“人民抗日救国会”（简称“人救”），在本地积极进行抗日救国活动。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入侵我国，在外交、政治、军事等方面加紧准备，七月七日，首先爆发了芦沟桥战争，接着，“八·一三”沪战爆发，群众中抗日热情沸腾，国共合作渐趋成熟。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与顾鉴修、薛惠民三人，举行

了紧急会晤，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决定改变过去秘密活动的方式，以“人救”组织的名义，以我们前阶段积聚的力量为骨干，由我和顾鉴修分别在梅李、浒浦两镇公开出面号召群众，发动抗日救亡运动，并以当时国民党允许的“抗敌后援会”组织名称，以爱国抗日青年的身份，发起组织梅李、浒浦的“抗敌后援会”，把我们的活动与广大群众抗日爱国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在方法上，以“人救”骨干力量为主，进行串联和号召，联络地方上层，并公开展发展会员。不到一个星期，在八月下旬，就召开了“梅李镇抗敌后援会”成立大会，我和华玉鼎被选为正、副主席，薛惠民、张致和为常务委员，共有会员五十余人。顾鉴修同志同时也在浒浦组织成立了“抗敌后援会”，也被推为主席，会员约三、四十人，其中不少人，如焦康寿等，以后都先后参加了“民抗”组织。

在梅李附近的塘桥镇，也由任天石出面，成立“梅李抗敌后援会塘桥分会”。前一段时间受过启蒙影响的镇上的店员职工，也都参加了这一组织。

梅、浒两地抗敌后援会的主要活动是：第一，每日出版油印刊物《电讯》（浒浦也出版类似刊物），报道当天的战况。因上海发生战争后，交通受阻，外地不能及时看到上海报纸，因此《电讯》很受欢迎。《电讯》除报道战况外，还辟有各类专栏，刊登有关抗战等方面的评论文章。第二，组织宣传队，到小集镇和农村茶馆进行口头宣传，并张贴标语、漫画等。第三，开展慰问前线将士的劝募活动。第四，组织会员参加政治理论学习，座谈民主与抗战、局部抗战与全面抗战等问题。

梅李、浒浦两地“抗敌后援会”组织起来后，对常熟东乡各地都有影响，各乡市镇的爱国青年，也相继成立“抗敌后援会”，因此我们又进行了互访、交流活动。

浒浦、梅李滨临长江，为后方重地；常熟东乡又紧接太仓和邻近沪郊浏河，国民党军队曾在此设防，挖掘工事，抗御日寇内侵，他们也要求民众协助开展保卫后方治安的工作。因此，我们的“抗援会”工作也为社会上的上层人士和国民党当局所重视。这样，区里有关抗日等方面的活动，都要“找我们”去开会讨论。

“抗敌后援会”成立后，我们整日忙于会务，布置收电讯、油印、参加宣传等。这时候，李建模已从狱中回来。同年（一九三七年）十月，我们见了面。我向他介绍了我们搞的救亡活动情况，和鉴修、惠民、致和等的近况，并请他帮助和参与我们的活动。他向我们谈了党在抗战问题上的路线、方针问题，并提出了加强对骨干的培养以及巩固、发展基本会员的意见。

从这次谈话以后，各地“抗援会”的工作迅速有了加强。约略过了半个月光景，李建模也来参加“梅李抗敌后援会”的活动，并组织了两次时政座谈，由他作了结论性的发言。但这时在上海战场上，我军已撤守昆山青旸江桥和太仓地界，战局更为紧张了。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不抵抗，不久上海即告沦陷。接着，日寇又突破了长江防线，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农历十月十三日），在我县高浦口、徐六泾口偷袭登陆，从吴市、浒浦分路迂回国民党军，企图配合日军正面部队的进攻，一路从吴市向昆山进发，一路占领梅李，经梅塘入侵常熟，再沿苏常公路包围苏州。登陆敌军沿途奸淫掠夺，见人杀人，见房烧房，再加敌机狂轰滥炸，广大人民群众，只得扶老携幼，相率避难他乡。梅塘两岸火光冲天，陈尸遍地，真是一幅凄惨景象。敌人的暴行在人民中间更加激起了无比的仇恨。

当时，我们对于日寇突然登陆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在敌人日渐逼近、形势起了变化的情况下，应该如何活动，也没有打算。日寇登陆前一天，常熟城内的救亡青年演出队还在王市等乡镇演出。直到敌军将要到达梅李，敌机前来轰炸的时候，我们才仓猝分散，随着老百姓一起避难。我和顾鉴修到达梅李镇一里多远的乡下，在顾行桥村头，遇到了李建模，他和家属暂避于此，当时我们作了简单的会晤和相约，就分手了。

以后，我和顾鉴修到无锡荡口，看到日寇仅仅占领了几个城市，广大农村和集镇尚是空白，这是发动群众搞抗日游击武装的极好机会。但是，在荡口避难的大都是一些有财产、有身价的上层分子，虽有民族自尊心，而他们的经济地位又决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不可能有实际行动。于是，我和顾鉴修决定回梅李找李建模、薛惠民商量后再说。

十二月初我们回到梅李乡下，李建模因为动身较迟，根本没有跑出梅李。薛惠民在国民党溃退时，被拉去当了伙子，回来也还不久。所以我们一到梅李，虽都在梅李镇周围乡下居住，却很易碰在一起的。经过事前的联系，就在小陆泾的官戴泾，由建模、惠民、鉴修和我四个人，召开了会议。会议决定：①由李建模为代表，去上海找党的关系。李建模原是梅李陆同福布庄驻上海的负责人，以此为掩护，进行过党的地下工作，在上海人地两熟。②分工联系群众。我和鉴修分别联系“抗敌后援会”和“人救”的力量。薛惠民联系农村青年及失去关系的农村党员。③打捞和收买国民党军溃退时遗弃的武器、弹药，为建立武装作好物质上的准备。

不久，临近旧历腊月，由于常熟城与浒浦港、镇都驻守日寇，常来梅李抢劫和随意枪杀人民，因此镇上居民，仍不敢返镇，大都还在乡下居住，梅塘河两侧较偏僻的自然村，成了生

活日用品的临时集散地。原梅李镇上参加过“抗敌后援会”的青年及“人救”成员，大都散居在梅塘两侧的乡村。为了寻找他们，我也以贩卖日用品为名，来往在梅塘河南北乡村，不久即联系上了参加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的张云达（即致和）同志，及参加过“抗敌后援会”的沈×、孙××等。我跟云达直接表明组织敌后武装抗日的意图，立即得到了他的支持，以后又通过他团结了一批青年。对沈、孙等几个积极分子，经过几次座谈，进行抗日爱国教育后，他们的思想也有了很大提高，为建立爱国抗日秘密组织积聚了力量。到旧历春节前后，梅李镇居民陆续返回故里，我们在镇上已正式建立了以张云达为骨干的抗日爱国秘密组织，大家推我为领导。

薛惠民也在他老家周围的几个村子（大溇、杏泾、薛家宅基）与失去组织联系的农民党员薛荷荷等一起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后来我和薛惠民以及他老家附近的农民积极分子在驸马泾一带河中打捞到了国民党败兵丢下的一些武器：有破坏了的重、轻机枪各一挺，步枪几枝和弹药等。我身边还有几十元，又由鉴修出面买了几枝步枪。当时一枝中正枪或七九式步枪，价格大约七、八元。最初只有二、三元一枝，后来涨价了，最高要二、三十元一枝。这样，我们就有了一点武装。因为我们没有军事知识，不熟悉枪枝性能，就请了一个未及撤退而留下来的国民党伤兵，在沈家桥的一个祠堂里，讲解使用、擦洗和保养枪枝的知识。顾鉴修在浒浦也团结了一批青年，如茆健群、王志昌等进行抗日救亡工作。茆在以后参加了我抗日武装，在新四军六团任作战参谋、一营营长、团参谋长，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收复兴化城作战时光荣牺牲。

加强党的领导 壮大人民武装

一九三八年二月上旬，农历春节过后不久，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前几天，经过李建模与上海党的联系，组织上派了杨浩庐同志，以贩货客人的身份，由上海来到了梅李，加强对抗日斗争的领导。杨浩庐来梅李后，住在李建模家中。第二天就分别见到了我、惠民和鉴修。商议决定李建模仍往来上海、常熟之间，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杨浩庐与抗日同情者张锡钧在梅李镇东街合股经营杂货铺，以掩护杨立足于梅李镇上。当时，顾鉴修分工济浦方面的工作（联系当地店员职工和争取客籍人工作），薛惠民分工负责梅李乡下农民工作，我分工负责梅李镇上的抗日工作以及与张云达经常保持联系。不久，塘桥部队建立。确定由我加强与塘桥任天石的联系，影响塘桥部队。我除了去塘桥做些政治思想工作以外，并去外地开辟工作。常熟北门有个布厂职工黄××，一九三五年初参加过“武装自卫会”，是小市农村人；还有一个金恒熙，原是梅李镇上的店员，也是小市人，曾受到《艺丝》的影响。我了解到他们都在家里，即去小市将他们联络在一起，经过几次活动，通过黄又发展他的一个同村弟兄，建立了抗日的秘密组织。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们拼凑了一些钱，在镇上开了一个小店，进行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在不长的时间里，团结了一批农村和镇上的青年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在这期间，也由我领导。此外，我又联系了隐蔽在镇上的王志平，以后我又将黄、金介绍给王，由王领导，王则直接与杨浩庐联系。随着抗日宣传、组织工作的深入展开和形势的发展，接着又建立了小市的抗日自卫队。周文在在整理陈震寰的部队（新六梯团）时，由王志平在小市带了一批人（数十人）充实到陈部，成为改造陈部的骨干力量。

一九三九年陈震寰部西撤后，这里又建立了“吴徐”常备队，“民抗”多次上升为“江抗”主力部队，都是以这里为基础的。

在这同时，我们又发动了吴市小学教师黄子云，并通过黄发展归松年等一批爱国青年建立了吴市抗日组织。以后，小市、吴市联成一片，成为“民抗”基地之一。接着，我又和在横泾当过店员的浒浦人周醒民，去横泾、陆巷、湘城一带开辟工作，组织王念劬等人，在横泾等地建立了抗日群众组织，发展革命力量（周醒民入党后曾任横泾区委书记，日寇清乡时牺牲）。在塘桥成立训练班时，我们在横泾、陆巷动员了一些知青、职工参加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后派回工作。接着又动员陆巷小学教师周嘉善参加“民抗”，以后又通过他与他的哥哥周嘉禄有了联系。

梅李及其周围的集镇上，有些客籍人，当时也以“抗日”为名搞枪、搞人，拉起了武装。梅李徐少川，浒浦赵培芝、赵培芳、张慕芳，王市赵培德，福山仲炳炎，董浜珍门吴文信，纷纷占地为王，有人、枪几十、一百、数百不等。他们中间小股的，有周行桥的王兴，师桥的马××，也有人、枪一、二十。至于再向东的集镇白茆口、张市等地，也都被这类武装所占领。而我们这时，还处于组织群众阶段。就是塘桥部队，也处于弱小地位。

塘桥部队的建立，是在杨浩庐派来梅李工作的同时开始的。一九三八年过了春节，任天石避难回塘桥后，即来和我商议成立抗日武装。我们同意由他借助当地一个有实力的毛鹏华的势力，发出号召，组织群众，以保家乡为名，建立武装（这时毛和当地流氓颜祖伟等已收集了国民党军溃退时丢弃的步枪七、八枝）。塘桥小布厂较多，沦陷后，布厂纷纷停工，职工失业，生活发生困难，对抗日的要求较强烈。在任天石的积极活动下，

成立了一支武装部队，参加这个部队的大约有一百多人。下设三个中队，并采用按田亩摊派款项的办法筹集经费，去上海郊区购买了一些枪枝。这个部队，号称一个大队，实际有枪枝六十多条。从小队长到大队领导，大都没有军事知识，成员中间，除了受任天石影响的一部分爱国抗日热情较高的人以外，有的是因为失业谋求生活来的；有的是为了出风头、捞钱发财来的；有的是地痞流氓混进来的。有个中队长叫毛珊，是毛鹏华的弟弟。他们的幼弟毛源，名为分队长，实际中队大权由毛源掌握，并是毛鹏华手下的一个打手。还有两个中队长叫徐恒伯、徐鹤松，虽出身布厂职工，但参加部队动机不纯，徐恒伯当了中队长，就仗势“抢亲”，抢了一个寡妇做了自己的老婆。因此，部队的指挥权实际掌握在毛鹏华和坏分子颜祖伟手里（颜后为我们镇压）。部队纪律松懈，军事生活很不健全，人员经常在茶馆里吃茶打牌，甚至下乡骚扰百姓。到了晚上，在街市上巡逻一下，就算了事。部队成立以后，为了要在周围土匪部队的包围中生存，毛鹏华拉拢徐少川，认徐为“老头子”，并给以大队长的名称，而徐也乐得借此力量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毛鹏华对这部队也很满足，根本不谈抗日，也不要军事生活与纪律，依此力量占有塘桥镇，设卡收捐，开赌收徒，以图私利，因此部队毫无进步，思想工作很差。③

在塘桥成立武装以后，何村镇的吴家段、朱村，梅李南部大、小陆泾等农村里，也有一些群众自发建立的武装，为了防止被周围的土匪部队吃掉，他们愿与塘桥部队取得联系。

不久，梅李附近大溇、严家坝、徐家宅基一带的农民，在我们党的影响下，掀起了一次反对汉奸强迫收租的斗争，几百农民涌到梅李镇上，捣毁了租栈，砸烂了伪警察分局，殴毙大

地主、“维持会”会长徐乾生。敌伪闻讯后，派兵士来抓去了十个人，杀害了为首的农民王小生。其余的被分别判处徒刑或无期徒刑。当时群情激愤，抗日情绪更加高涨。我们就利用时机，在农民中间组织了“抗日会”，在“抗日会”中间又建立了秘密武装组织。“抗日会”的会员中，有的还入了党。

这样，在常熟东乡人民群众中间，抗日力量日渐有了发展和壮大。梅李乡下的“抗日会”中的秘密武装组织，就是后来常熟“民抗”塘南常备队的基础。

“民抗”正式成立 抓紧军事训练

到一九三八年四月间，任天石要求党派人来领导塘桥的部队，加强军事教育，整顿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以适应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我们向上海党反映了这个情况和要求。五月，上海党又派来了懂得军事的赵伯华同志，决定和杨浩庐同志公开出面到塘桥部队工作，除了加强对塘桥部队的上层分子的联系以外，主要工作应放在部队的下层，去争取他们，影响他们。为了培养军事骨干，还以这个部队的名义，办了个训练班。

训练班于五月中旬在塘桥乡下蒋泾的周家宅基成立，举行了开学仪式。参加训练的主要 是塘桥部队的分队长、小队长，还有的是从小市、吴市、浒浦、横泾等各地群众组织里动员来的店员职工、知识青年和从梅李乡下秘密武装组织中抽出来的农民。但从塘桥部队中抽来受训的人员，有不少人过不惯严格的军事生活，训练还未结束，就丢下了枪，自动跑回塘桥部队。坚持参加训练直到结束的，共约三十多人。

训练班中，成立了管委会，由杨浩庐、赵伯华任正、副主任，分别负责政治、军事训练。任天石、顾鉴修和我都是班委。

在训练班里，主要是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以及抗日救国持久战的教育。

在训练班结束时，于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正式成立，就在训练班原地的塘桥乡下蒋泾周家宅基召开了成立大会，推徐少川为大队长，毛鹏华、任天石为大队副，赵伯华为参谋长，杨浩庐为政治主任。徐少川是赵培芳的徒弟，在客籍人中，徐还有些爱国民族意识。徐出身下层（沦陷前以打捞渔船上的盐水脚为生），顾鉴修在徐到梅李前，对徐进行过工作。徐手下的小陆兴，也有一些枪枝，因此我们研究推他为大队长。这对缓和我们部队与浒浦土匪赵培芳的矛盾也有利。半个月后，又在梅李驸马泾召开了有何村、上下小陆泾等地群众参加的大会，宣布我“民抗”与“大队部”的成立和号召农村普遍组织不脱产的抗日自卫队。当时还宣布建立以杨浩庐、赵伯华为正副主任的带有统战性质的军政委员会，参加军政委员会的，除任天石、徐少川、毛鹏华以外，还有顾鉴修、薛惠民和我。塘桥部队的三个中队长也参加了，共十一人。“民抗”大队部的武装力量是由训练班结束后留下来的人员组成的。徐少川和毛鹏华是不来大队部的。“民抗”成立大会后，训练班的一部分人分配回原地，组织发动群众。留下的一一个班的武装，由杨浩庐、赵伯华率领转移到梅李附近的大溇驸马泾，和我们从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群众武装结合在一起。白天操练学习军事政治，晚上移动，从此我们便有一支自己能直接控制的武装部队，更重要的是，有了这支武装力量，为发展和壮大人民武装，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以后我们就以“民抗”大队部的名义为号召，组织适龄青壮年普遍建立自卫队。党组织也恢复了，成立了抗战时期的第一个县委，由李建模任县委书记，委员杨浩庐、赵伯华。我和薛惠民在县委建立后不久，

就正式恢复党籍。

坚持统战政策 推动抗日救国

“民抗”正式成立后，为了发展和壮大武装力量，扩大直接控制的地区，我们又作了研究，把薛惠民老家（大溇、杏泾等）的秘密武装组织，公开宣布为塘南抗日自卫队（“江抗”会师后改称为常备队，属半脱产），薛惠民为政治指导员兼队长，任天石和我分别去塘北何村的吴家段、朱村（都属涌金乡）和梅李上、下小陆泾，去做部队工作和地方工作。上、下小陆泾在寨角以南，靠近锡沪公路的古里、苏家尖，我们如控制了这个点，再向两侧扩展，则梅李到塘桥、梅塘河南部到公路一侧的广大农村，都在我们掌握之中了。

其时，上、下小陆泾都有一支民间自发组织的武装。上小陆泾的部队，是分散在沿小陆泾河南北王家宅基一带，下小陆泾的部队，分散在小陆泾河旁的武家湾、朱家湾、官屯等几个自然村子里。建立武装的发起人是王永喟和武××，他们都是农民出身，较有胆识，两部也有二十多人、十多枝枪。部队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保家乡、防土匪，但部队缺乏军事教育，担心周围土匪来缴枪，因此主观上也要求与塘桥部队取得联系。

我到上、下小陆泾的两个部队工作，是以“民抗”大队部政训员的名义去的，在部队里，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同时在群众中展开抗日保家乡、反土匪的宣传。我去工作后不久，大队部八月中也流动到上小陆泾一带宿营与活动。大队部的到来，对参加这两个部队的战士，在思想上起了不同的影响：一种思想认为，既然抗日，就应参加一支象样的部队；另一种思想认为，还是在地方好，既可以抗日保家乡，又可以照顾家

庭。在我们明确的动员宣传工作下，大多数人愿意参加“民抗”，带枪编入到主力分队里，少数人留下为地方骨干，与新发动起来的新队员，组成不脱产的抗日自卫队，仍由王永喟和武××等任自卫队长。从此，清水江、大陆泾两侧都为“民抗”所控制，成为此后“民抗”可靠的后方基地。

塘北的何村镇，当时约有居民一、二百户，是一个东西一条街的小镇。镇上设有布店、染坊、药店、南北杂货、糕点和茶馆等店铺。这里集市热闹，市面繁荣，经济比较富裕。何村两侧为涌金和大奎两乡，涌金乡土地较集中，地主、富农较多；而大奎乡土地比较分散，佃农和小自耕农为主，富农较少。这个地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除地主和富农外，镇上和乡下都有国民党员。何村镇上有国民党员四人，其中两人分别任过梅李区的区长和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另两人，一个是小学校长，稍有正义感，一个是商业资本家。涌金乡有一个国民党员姓杨，较为反动，但和镇上当过伪区长的国民党员有矛盾。大奎乡顾方桥的顾鸿逵和塘坊桥乡下的陆宾等，也是国民党员，但他们在大奎乡群众中有威信，也有联系，对孙中山个人和三民主义是有信仰的，认为国民党没有实现孙中山的主张。他们对镇上和涌金乡的国民党员是不满的。在北伐战争时，他们参加过“农民协会”，对梁漱溟的农业改良政策较有兴趣。

沦陷初期，老百姓避难归来后，有涌金乡的吴家段、西洋泾、朱村等几个大村的地主、富农出面征集资金，购买了二十多枝枪，由肖家宅基富裕中农肖启元和朱村的小地主赵德二人带队，以抗日为名，保家乡为主，成立了二十几人的何村部队。参加部队的有农村的贫下中农，镇上的职工和店主的子弟。部队组成后，就和塘桥毛鹏华、任天石联系，以为依靠。镇上的那些国民党员对部队是看不起的，对抗日也是害怕的，但对

这支由中、小地主、富农领导、组织起来的武装，却又是同情的。

在大部队成立后，任天石同志就去何村坐镇。他在那里重点做好这支部队上层阶层的联络工作，以推动他们和“民抗”的联系，进而达到控制这支部队的目的。三八年九月中旬（中秋节）任天石回大队部，接着由我去何村，身份是“民抗”政训员，根据党组织对部队和地方工作的指示精神，在抓好部队的整顿与开展群众工作的同时，结合对何村镇上和乡间的上层进行工作。我在何村部队发源地的吴家段蹲点，对这支部队开展政治教育，重点是爱国主义教育和军事纪律教育，禁止随便捉赌、抓人。通过串门访问和分别召开村民大会，宣传抗日和保家乡的关系，讲清“团结起来力量大”的道理。宣传工作深入到何村镇东部的大奎乡，争取和影响顾坊桥的私塾教师顾鸿逵，并通过他联系了更多群众。不久，大奎全乡直到梅李镇北，都扩大成为我们的地区了。

对该地区的国民党员和地主富农的处理上，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结合具体情况，分别对待。对国民党员：①对镇上那些本质反动，但没有发现破坏或损害当地武装和我们工作的，采取稳住不动的原则，还及时通过有关者进行政治教育，鼓励他们抗日爱国。②对那些在信仰和认识上同我们不同，但还是抗日爱国的，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使他们靠拢我们，促使他们的思想逐渐有所转变。对有正义感的那位校长，还作过礼节性的访问和联系。③对国民党员之间的内部矛盾，只要不影响抗日保家乡，我们不去参与。

对出身中、小地主和富农的上中层人物，采取争取他们靠拢我方而不为敌方利用的政策。当时我们分析了塘北这些阶层，由于我们保家乡的主张和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在反

土匪斗争上给予他们一定程度的信任，同时与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相结合，对他们进行爱国抗日教育，提高他们的认识，接受减租措施。此后我塘北地区虽经历土匪的占领，这些上、中层都没离开过我们。

整顿武装 提高素质

武装力量逐渐扩大，提高部队素质已成为迫切的问题，我们研究，首先要把塘桥部队整顿好。当时，部队的控制权还在毛鹏华手里，我们即以“民抗”大队部的名义，要求他们严守军纪，并向他们讲清真正抗日打鬼子，一定要有军事生活、军事训练，否则，可以回家不干。其时，毛鹏华所依靠的主要力量是毛源部队，分驻在梅李镇上。由于毛源与徐少川徒弟小陆兴，在经济利益上争“地盘”，产生矛盾，在九月初毛源到徐少川处谈话后，返回梅李街后驻地，途经“竹林”时，被埋伏在那里的小陆兴当场击毙。毛源这部分部队虽由几个班长率领返回塘桥，但毛鹏华整个部队的力量和情绪大受影响。恰在此时，塘桥的一些布厂，要他们复工。这样，塘桥的三个中队里，不少人离队进厂，或回家务农。那个“抢亲”娶老婆的中队长也回厂当会计了。对少数流氓成性、作恶多端的坏分子，则进行打击，有的予以逮捕，以改正为条件，由人保释回家；对最坏的几个坏分子予以镇压。对愿意抗日、接受军事生活较好的部分战士（包括毛源死后由班长带回的部分战士），都陆续编进“民抗”主力的第三分队。对毛鹏华本人，在他的部队被我争取和瓦解的情况下，我们把他逮捕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令其交出枪枝，退出“民抗”，但在经济上给予照顾，回到社会上经营商业。